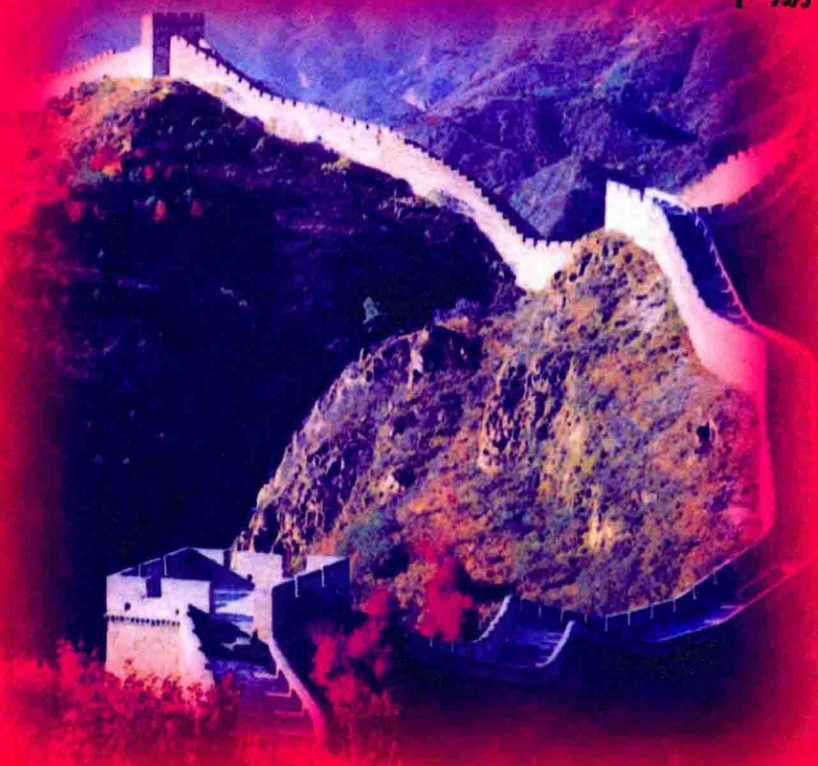


SHENZHOU
DIYIREN

编者：郝巨恒
编审：赵孝石
封面设计：郝巨恒

神州第一人

下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神州第一人

主 编 郝巨恒

下 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州第一人 / 郝巨恒主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3

ISBN7-5017-4782-2

I. 神… II. 郝… III. 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1444 号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编: 130022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春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1.5 字数: 111.7 千字

1999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500 册

2002 年 1 月 22 日第 2 版 2002 年 1 月 22 日第 2 次印刷

印数: 5500 册

2007 年 3 月 1 日第 3 版 2007 年 3 月 1 日第 3 次印刷

印数: 2000 套

定价: 88 元(上、中、下册)

版权独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孔
庆
芬

中国第一位远洋轮 女船长

孔庆芬 1933 年生于天津，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远洋轮女船长。

孔庆芬少年时代就刻苦学习，1949 年考入河北工学院，后来因病休学。虽然离开学校，但她一直坚持自学。后来到天津航政局当打字员，之后任港务监督员。1953 年，20 岁的孔庆芬登上了“和平一号”海轮学习驾驶轮船。她的父母都不同意她学开船，认为一个女孩子，做教师或当医生才是好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既清洁卫生又是个文明职业。学开船，每天在大海里、抛家舍业，还有危险……

孔庆芬说：“我爱那蓝蓝的大海，大风大浪更能锻炼我的意志。”从此，她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航海生涯。

孔庆芬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师傅请教，进步很快。1954 年，通过交通部考核任三副，1958 年升任二副，1968 年升任大副。翌年，经船长技术鉴定考试，被提升为船长。孔庆芬成为中国航海史上第一位远洋轮女船长。

1971 年，在指挥三千吨货轮“战斗 67”号由大连港启航途中遭遇风暴，在船体倾斜七度的危险时刻，孔庆芬临阵不慌，指挥若定，使货轮安全抵达天津港。

1974 年，孔庆芬任万吨油轮船长。1976 年获远洋轮船长证书，指挥万吨级货轮“风涛”号首航日本。她以熟练的技术和丰富的航海经验，越过了 3 米的大浪区，5 米的狂浪区，胜利抵达日本，首

曲
格
平

中国第一个开创 环保事业的人



曲格平，1930 年出生于山东肥城，1952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艺术系，后又到有机化学专业进修，1958 年任保定电影胶片厂副厂长，以后到化学工业部当处长，1969 年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处长等职。

1970 年，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成为 16 成员之一。那时正处“文革”之中，政府的正常工作几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根本无暇奢

谈什么环境问题。但周总理高瞻远瞩，注意到西方国家正在兴起“环保运动”，并多次提到环境保护问题。周总理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时，得知随行人员有她的女儿中野纪邦，是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公害记者，就特地与这位女记者长谈至深夜，详细了解日本的公害及其防治情况，很受触动。次日周总理就指示组织一场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报告会，请这位记者介绍公害问题。会后，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负责人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也认识到环保是一件大事，决定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指定一人兼管这方面的事情。由于曲格平负责与石油化工方面的联系，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他。从此，曲格平便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曲格平接受任务后，首要工作是查找国外有关环保方面资料，并将重要内容摘编出来供领导参阅。当时国内这方面资料十分零散，他不得不向有关单位和众多的热心人求助。随着对环境认识的提高，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环境保护问题，遂萌发了编辑一套“国外公害丛书”的念头。当时正值“文革”浪潮中，任何介绍外国情况的文字，都可能招来不测之祸。但曲格平用尽精力，继续坚持翻译出版工作，后有关领导责令丛书紧急“刹车”，虽然没有按计划出齐这套丛书，但也完成了《世界公害概况》、《城市公害及其防治》、《冶金工业污染及其防治》、《公害与农业》、《污染环境的工业有害物》、《海洋污染及其防治》、《核污染及其防治》、《轻工业污染及其防治》、《只有一个地球》等 10 余本书的翻译出版，使国人了解到严峻环境的现实。

1972 年，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第一次环境会议，曲格平被选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归来后，他为机关干部作了一次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国外的情况，也分析了国内的环境形势，指出中国在一些方面的环境污染情况很严重，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1982 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下设环境保护局，曲格平担任环境保护局局长。地方环保机构也相应纳入政府序列，环境监测、科研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环保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之后，曲格平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环境署首席代表。

1987 年，曲格平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经验，提出“环境管理与环境建设”的新概念，他指出，“环境管理的基本职能是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而环境建设则是环境监督管理的对象。”从而使两者之间职责不清、界线不明的问题得到解决。

同年，曲格平荣获联合国环境署金质奖。

1988 年，国家在机构改革中，正式设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曲格平担任第一任局长。在曲格平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经十几年的努力，到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环保政策的基本框

架逐步形成。同年，曲格平的有关论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本人又获英国布莱德福大学工程博士荣誉称号。

1989年，曲格平为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他在总结国外环保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做法，确立了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体系的“八项制度”。并在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上公布，为中国环保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

1992年，曲格平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上，被授予联合国环境大奖，这是目前国际上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由于他在国际环保界的声望，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还聘请他为环境事务特别顾问，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也纷纷聘请曲格平担任职务。

1993年初，曲格平离开了国家环保局局长的岗位，出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决策学会理事长，中国环境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北京、清华、同济、武汉等大学兼职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著作有《中国环境问题及决策》、《论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世界环境问题的的发展》、《中国环境管理》等。



共和国第一个用 广告征婚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给人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什么“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名媒正娶、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造成了无数家庭悲剧，葬送了无数男女的青春，又不知有多少男女悔恨终生。新中国成立后，宪法明确规定，党和政府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坚决摒弃父母包办婚姻，破除了封建的婚姻观念。改革开放后，人民精神振奋，思想活跃，婚姻意识也有了新的飞跃。1979年在中国的婚姻史上发生了一场风波：中国第一桩征婚广告在《市场报》上刊登了，征婚人丁乃钧。

丁乃钧是四川省江津县中学教师，1979年已过三十岁的丁乃钧，因种种原因还未成家完婚，沉重的负担，使他心情郁闷。有一天，他翻看新创刊不久的《市场报》，当看到各种信息和各种商品广告时，一道灵感突然在他脑中闪现：市场报既然能发表商品、信息广告，为什么不能发表征婚广告呢？

于是，他立即提笔写了一篇“寻佳偶”的广告，连同自己的处境以及为什么至今独身、寻偶条件、联系方法等的信件一起寄给了《人民日报》创办的《市场报》编辑部。

《市场报》收到了丁乃钧的征婚启事及信件后，深感惊疑。惊的是新中国“第一个”征婚广告，让他们碰到了；疑虑的是关于征婚的政策界限如何掌握，当时毕竟是文革后期的中国啊！感到棘手。

为此，报社为发不发表这则征婚广告开了四次讨论会，还专门请示了上级主办机关《人民日报》社，报社有关领导决定“刊登”，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征婚启事在《市场报》上发表了，为后来他找到伴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从发表征婚广告的编排上可以看出报社大胆发表征婚广告的同时，也采取了某种小心谨慎的技术处理。可喜的是终于越过雷池，为媒体搭红桥开了个好头。

《市场报》的发行量当时只有5万余份。读者大多是商家，商人重行情，对其它事不够关注。征婚启事发表三个月，并未引起人们太多注意。

后来，广州一家文摘小报摘录了这则征婚广告。因为这家文摘小报的读者多是社会各界妇女，尤其是中、青年妇女，发行量较大。征婚启事自转载后经过短期的沉默，终以旋风般的态势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件新生事物，不仅仅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而且波及到海外，特别是华人聚居地，人们把这则征婚启事看作某种征兆，一种国门敞开的象征。

因为有了丁乃钧先生冲出世俗偏见的大胆作法，加之《市场报》的大力支持，才有后来大小报刊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征婚广告。因为有了丁乃钧的特别“征婚广告”，中国婚姻史上才有新的突破。征婚广告给广大人民选偶铺上了一条走向美满婚姻之路，深受人们的欢迎。

姜

维

新中国第一个私营业主

1980年，姜维从战斗了11年的部队回到了大连市。等待了漫长的8个月，大连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迟迟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无奈的姜维萌生了干个体的想法。干什么呢？要不给游人照相看看？于是，姜维用他妹妹干临时工挣的400元钱，在大连动物园门前开了一个“照照看”摄影摊。

1980年底，“照照看”摄影摊在寒冷的一天开业了。一张彩照收费2元钱，能赚1元钱，一张黑白照片收费1元钱，能赚7角钱。第一天，姜维赚了3元钱。现在看这3元钱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但他那时感觉3元钱沉甸甸的。晚上回到家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部队回来的战友，一个月工资也不过50元钱，我如果每天赚3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90元钱，太“厉害”了。

姜维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发大财的感觉。那一天，即1981年5月1日，风和日丽，来大连动物园的游人相当多，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太阳西下，姜维一直没有闲着，一天都是站着的，脚掌肿起很高。

当天晚上回到家，姜维把装满零钱的口袋交给母亲，他感觉这一天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全家人坐下来一起数钱，天哪，竟然是500元钱。一天挣了500元钱，这是真的吗？姜维都傻了，他把桌子上的钱捧起来撒了一屋子。

为了多挣钱，姜维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吃完早饭，骑半个小

时的自行车赶到大连动物园门口的“照照看”摊位。中午他基本上是吃一个包子，白天几乎不喝水。为什么？怕上厕所。万一上厕所的工夫来了客人，不就丢了买卖吗？

收摊后，回到家的姜维并不轻松，尽管已经是晚上8点钟，他还要呆在简陋的暗房里冲一个小时的胶卷，趁晾晒胶卷的工夫，再抓紧时间吃口饭，等将相片放在水里，已经到凌晨了，于是上床睡一会儿觉。凌晨4点钟，父亲起床为照片上光，5点钟，母亲起床将照片一一放在小纸袋里，直忙活到早上6点钟姜维起床。那时，由于日复一日的过度劳累，姜维天天盼着下雨，因为只有下雨才能“允许”自己休息一天。

1984年1月1日，姜维在大连市中山路以每月60元的价格租了一个占地一平方米面积的“门脸”，干起了“姜维影书社”。这就是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的诞生。

1984年2月，香港一位姓廖的先生到大连考察，提出想见见“很能干的个体户”姜维。

廖先生对姜维说：“香港人特别佩服大陆的个体户，有出息！听说你是搞照相的，这样好不好，我有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不赚你的钱，成本价，19.8万元一台。”

姜维当时就出了一脑门子汗，心里说：“天哪，19.8万元，我不吃不喝也没有这么多钱呀。”

回到家里，姜维想，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户能不能搞合资呢？廖先生出设备我们出场地、人力，这样的合资不是很好吗？当姜维第二天把想法告诉廖先生时，廖先生很高兴，约姜维后天下午2点钟在北京饭店见面细谈。

当时坐火车从大连到北京，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姜维便坐飞机去了北京。

然而当姜维兴致勃勃地返回大连咨询合资的手续时，大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有关人员的答复却泼了他一身凉水：《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外商、港商、台商合资，因为个体户没有法人资

格不能签字。

心灰意冷的姜维又来到北京，住在母亲熟悉的一位叔叔家。每天，他都要跑有关部委。就自己的有关事宜查找资料、进行咨询，但没有一点希望。

有一天，姜维正在叔叔家里休息，来了一个人，把他带到北京台基厂警卫林立的17号院，走进一栋楼，绕过一个很长的长廊，来到一个房间，一位白发老人端坐在那里，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王老讲：“我听人说过你，我今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听你讲故事。”姜维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用4个小时的时间，讲了自己坎坷的从业经历，当讲到自己在大连动物园门口的摊位执照被人没收了时，王任重拍案而起：“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如果人民还过不上好日子，我死不瞑目！”

王任重最后问：“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

“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谈谈合资的事情。”

王任重立刻给当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任局长写一封信：“兹介绍大连很有理想的青年与你见面。”

姜维刚回到叔叔家，就来了一个人对他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任局长要见他，明天上午8点钟让他去一趟。

1984年4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姜维颁发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1984年8月10日，姜维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与港商合资创办了光彩实业股份公司。

追忆似水年华，姜维感慨万千。1990年，刚进不惑之年的姜维因业务去日本，在一次晚宴上，结识了一位29岁的日本女翻译，互生好感，喜结良缘，从此定居日本。现在，妻子是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的高级职员；去年，被评为这家保险公司的十大杰出女性。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1992年4月初，江泽民总书记到日本访问，亲切接见了。1998年4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日本访问期间，也接见了姜维。

在北京金朗大酒店 14 层，记者采访了姜维。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姜维非常兴奋，因为他刚刚得到了国家授予的光彩事业特殊贡献奖。中国只有 25 人获此殊荣。

他被称为共和国第一个创办私营企业的人。

梁国新

中国第一个创办 婚姻介绍所的人

几千年来，中国的男婚女嫁，一直都是由父母作主、媒人撮合。这样的包办、买卖婚姻，不知坑害了多少青年男女。有的性格不合，没有爱情，使他（她）们痛苦终生；有的造成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求偶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得到美满的爱情归宿。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件新生事物出现了：梁国新勇敢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中国办起了婚姻介绍所，这正是中国第一个婚姻介绍所。

梁国新，河北省正定县平乐村青年农民，儿时因患麻痹，双腿致残，走路拄双拐，或坐轮椅。他头脑聪明，爱好文艺。初中毕业后，在村里组织文艺宣传队。这时，一位很不错的姑娘爱上了他，因为梁国新是残疾人，姑娘的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姑娘被迫远嫁外地。

姑娘的离去，梁国新很痛苦。关心他的婶子、大伯们对他讲：“你是有毛病的人，不好找对象，还是花钱买个媳妇吧。”梁国新摇摇头说：“不，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买媳妇。”

由于自己婚姻的失败，梁国新想到农村像他一样的残疾人，难道他们就不应该有爱情吗？难道残疾人就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吗？经过反复的思考，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心里形成了，他要搭一座鹊桥，让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兄弟姐妹在这里相识、相知、相爱。主意已定，说干就干，梁国新挂起了“鹊桥联谊中心”的牌子。中国

第一个婚姻介绍所就这样诞生了。

“鹊桥联谊中心”为未婚青年男女、残疾人、丧偶再觅者拓宽了择偶天地。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鹊桥联谊中心”很快得到人们的承认和欢迎。

1984年4月，梁国新专程从北京将自己创办“鹊桥联谊中心”的初步作法向全国妇联汇报，得到全国妇联的鼓励和支持。《中国妇女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有人取笑梁国新：你自己还没找到对象，怎么能给别人搭鹊桥？面对这样的问话，梁国新没做正面回答，心中有自己的打算，他在一份杂志上登了征婚启事。

一天，梁国新收到一封来自云南会泽县的书信，拆开一看，是一封奇怪的“天书”，纸上画着一棵枯树，一只燕子、几朵乌云，署名赵菊莲。梁国新反复琢磨，终于悟出画面的意思：乌云、枯树说明她处的环境不好，心情不佳；孤燕一只，是她希望得到爱情，以求比翼双飞。梁国新看后，就在这张画上用彩笔在枯枝上画出绿色树叶，在乌云上面画一个红太阳，在小燕子前方又添了一只回首顾盼的燕子。画好后又把这封信寄回原处。结果，信发出半个月，云南的“燕子”飞来了。赵菊莲——一位高中毕业生，城镇户口，品貌端庄的姑娘，爱上了梁国新这个农村户口、初中毕业的残疾人。

自“鹊桥联谊中心”创办以来，收到全国各地大量的征婚求友信，梁国新认真处理每一封信，把信件内容分门类别，编成“鹊桥内参”，根据征婚人的不同标准，为他（她）们牵线搭桥。

梁国新创办的“鹊桥联谊中心”，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通过这座鹊桥，许许多多的青年、中年、老年征婚者找到了满意的配偶，建立起温馨的家庭。

梁国新为社会做了一项有益的事业，他前面的路和他创办的“鹊桥联谊中心”一同在延伸。

储家慧

中国海关第一位 女驯犬员

储家慧今年 31 岁，是北京海关缉毒犬培训基地的女驯犬员，也是中国海关史上第一位女驯犬员。

储家慧 1981 年参加工作，一直在首都机场从事海关征税工作。后来海关成立缉毒犬培训基地，她主动要求当驯犬员。这消息一传出，就成了北京机场不大不小的新闻。领导对小储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呀，胆小的男同志都不行，何况你又是女同志，弄不好不但衣服被狗撕破，人被咬伤，还有更大的危险啊……”有的同志说：“你不是开玩笑吗？哪有女的去驯犬？”亲属朋友更是左拦右挡，劝她说：“在机场征税，工作多清闲，一个女人，成天跟狗打交道，再说那也不是女人干的活，连件好衣服都穿不出去，你不怕别人笑话吗？”小储失眠了。领导的关心和照顾，家人的担心都是善意的；同志们说的“那不是开玩笑”，却也含有不信任的味道。储家慧说：“我国各行各业都有女同志，而且出色的也不少。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了女驯犬员，唯有我国海关还没有一个女驯犬员，为什么我不能做第一个女驯犬员呢？”储家慧决定了，领导批准了，家人和家属也勉强同意了，储家慧走上了驯犬生涯。当储家慧跨进基地的院门，迎接她的便是震耳的咆哮。

教员带出一条名叫“拉尔”的犬交给储家慧，将拉尔的调教任务交给她。这是一只纯种布拉多犬，周身漆黑，皮毛光亮整洁，如同锻子一般，怎料到拉尔先她一步，“呼”地一声扑上来，两只前爪直搭小储的肩头，险些把她扑倒。